

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及相关问题探讨

辛中华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 本文在近年来考古发掘材料的基础上对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文化性质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以及马家窑文化与四川盆地早期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等作尝试性的探索。

关键词: 岷江上游; 新石器文化; 姜维城遗址; 营盘山遗址; 马家窑文化

中图分类号: K87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 (2005) 01—0009—07

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是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考古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川西平原、川东峡江地区分别发现了众多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基本建立了各自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但这些早期文化时代大致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相当,绝对年代上限不超过距今5000年,因此追寻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源头的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了川北嘉陵江、川西北的岷江上游和大渡河流域等有着更新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或与黄河上游早期文化关系密切的区域。

人们对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最初的认识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汶川县威州镇南部的姜维山上彩陶片的发现^[1]。此后的七、八十年间,四川省文管会^[2]、四川大学考古系^[3]等单位先后在包括姜维城遗址在内的岷江上游地区进行过多次的调查和试掘,但一直没有发现比较科学可靠的原生文化层堆积;因此在很长时期内对这一区域早期文化面貌的探索和研究只能停留在零星实物资料如彩陶片、石器等的分析上,只是直观地感觉到这一地区的早期文化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这种雾里看花只认识了一个轮廓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更清楚认识和揭示的是:1、该区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内涵、发展演变序列。2、与西北马家窑文化的关系,后者南下的传播途径、影响范围、自身演变过程、同四川盆地土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过程、具体文化因素的反映。3、与嘉陵江、大渡河、川西平原等周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4、这一区域性早期文化在四川盆地甚至中国古代文

明形成中的地位 and 作用等等。

2000年以来四川省考古所、成都市考古所等单位在岷江上游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试掘和发掘工作,尤其是汶川县姜维城^[4]、茂县营盘山^[5]等为代表的史前遗址的发掘,揭露了丰富的文化层堆积和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遗物,为我们寻求和探索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了更多全新的材料。

一、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

通过姜维城和营盘山遗址的发掘,我们基本了解到岷江上游早期文化的特征。

生活用具:陶器最具特色。以泥质灰褐陶为主,其次是红褐陶,另有少量黑褐陶、褐陶;夹砂陶占一定比例,基本都是夹粗砂,尤其以屙夹石英石和片岩加工成的碎石粒粗砂类居多。素面为主,其中的磨光陶占绝大多数。器形则包括高领罐、罐、喇叭口罐、重唇小口瓶、钵、盆、壶、缸、器耳、器盖、纺轮等,绝大多数是平底器,只有个别圈足。绳纹自始至终都占主要地位,其次是附加堆纹、箍带纹、弦纹、戳印纹、镂孔、方格纹、划纹、瓦棱纹、乳钉纹等。彩陶图案的题材有条形纹、弧形纹、网格纹、草卉纹、瓜棱纹等;器形包括瓶、罐、壶、盆等,也都是平底器。

陶器制作上由于夹砂陶的颗粒大,烧制的火候比较低,质地粗糙疏松;泥质陶则非常细腻,火候很高,质地坚硬,扣之还有铿锵之音。大多数陶器胎较薄,只有部分夹砂陶的胎偏厚。多是

手制,大型器物多采用泥条盘筑法,许多器物的颈部、底部内壁能见到泥条相接的痕迹,部分泥质陶器的口沿有慢轮修整的痕迹,杯、钵等小型器物则直接捏制。总体上这一时期陶器加工技术尤其是烧造水平是相当高的。

生产工具:打制和磨制石器为主,二者比例相差不大,另有少量的骨器和纺轮。打制石器的材料以砾石和片岩为主,器形包括有肩石斧、石矛、网坠等;还有一定数量的细石器,系燧石和石英石剥制而成,主要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等。磨制石器多取材于砾石、片岩和石英石,器形大多比较小,包括斧、凿、镑、穿孔石刀、两端缺口石刀、石杵、饼、纺轮等。虽然姜维城遗址和营盘山遗址出土骨器中不乏磨制非常精致者,但总的数量比较少,器形也主要是针、锥等。另有一些陶质和石质的纺轮,为圆饼形。

房屋居住遗迹:都是平地起建,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基本都朝向岷江河谷,有单间也有多间建筑;屋内有火塘、红烧土块、柱洞、基槽等。建造方法之一是木骨泥墙,应用比较广泛;另一种如姜维城遗址的F2残存的一段墙基部分,用细泥拍筑成,墙内壁有涂抹白灰的痕迹。

精神生活:姜维城、营盘山遗址都出土有为

数不少且磨制非常光滑精致的陶、玉石器装饰品,包括镯、环、璜等。营盘山遗址还出土有捏塑人面像,体现了一种朴实的写实艺术风格,反映出当时人们具有比较浓的审美意识^[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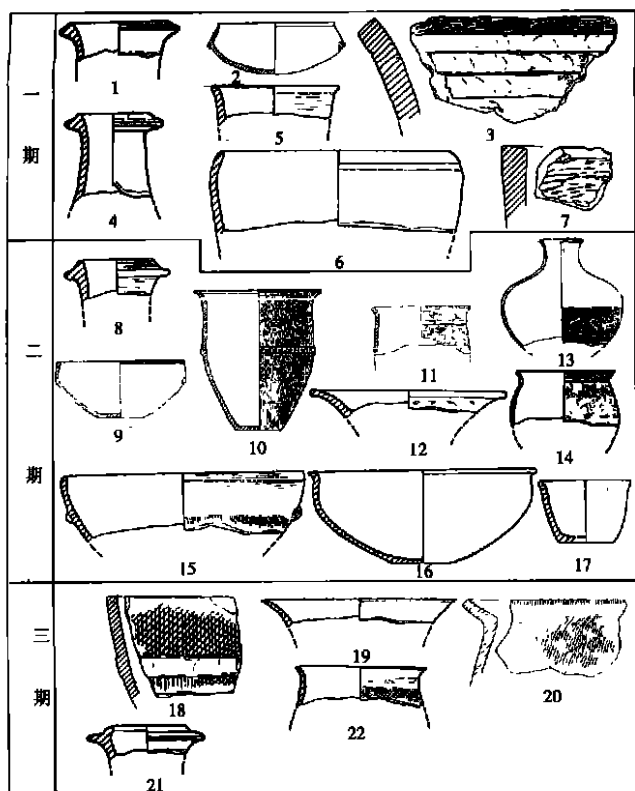
墓葬:目前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只在营盘山遗址发现有4座墓葬,而且都是灰坑葬的形式^[7],这种葬式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的遗址中也经常见到,其中河南浉池斑村遗址庙底沟遗存中还有人殉的灰坑葬^[8],营盘山遗址中也有肢体不全者,因此不排除有人殉的可能。但甘青地区从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直到卡约文化都比较盛行“二次扰乱葬”的人骨处理方式^[9],这种葬式伴随着马家窑文化进入岷江上游也是顺理成章的。

二、姜维城遗址陶器分期及特征

姜维城遗址是目前该区域堆积深厚,延续时间较长的遗址,文化内涵应该涵盖了众多其他的遗址,根据地层迭压、打破关系和器物组合的变化特征可以分为三期五段^[10](图一)。

一期一段:泥质陶占90%左右,灰褐陶约六成,其次是红褐陶近30%。夹砂陶仅10%多一点,基本不见有夹细砂陶,都是用当地页岩和片岩加工成长度在0.4~1.2cm左右的粗大颗粒,质地粗糙。素面为主,其中的磨光陶在八成以上;纹饰陶中绳纹占到了近50%,其次是附加堆纹、复合纹、弦纹等。器型组合主要为AI、BI式高领罐、I式折腹罐、AI和BI式罐、I式重唇小口瓶、AaI、AbI、BaI式钵、CI、CII式盆、I式缸、AI、BaI式深腹罐,基本都是平底器。其中大多数夹粗砂缸和深腹罐的口沿上压饰绳纹,颈部和器身则饰比较粗的箍带纹。都是手制,少数泥质陶的口部和颈部有慢轮修整的痕迹。泥质陶的质地和烧制火候比较高。彩陶的数量不足1%,题材有弧形条带纹、网格纹、圆点纹等,器形包括瓶、罐、盆等。这一时期出土了大量兽骨,部分有烧过的痕迹。石器中磨制和打制并重,器形有石斧、镑等,另有一些细石器。

一期二段:该段的夹粗砂陶有少量的增加,约占到25%左右,质地和火候没有



图一 姜维城遗址出土陶器分期

太大的变化,泥质陶中的红陶的数量有所减少。素面为主,纹饰陶中绳纹仍然占绝大多数,但夹粗砂陶的罐、缸类器所饰附加堆纹逐渐的变细,并由带状和圈状向横向和斜向的间断绳纹变化。器形组合以I式高领壶、I式折腹罐、II式的Aa、Bb、Bc型钵、II式重唇小口瓶、II、III式缸、II、III式深腹罐等。这一段发现的动物骨头数量和种类与前一段差不多。石器数量有所增加。

二期三段:陶器器类和数量有了比较大的增加,泥质陶的比例略有变化,在84—90%左右,但其中的红陶数量有所减少,基本在14—20%之间。素面磨光陶为主。纹饰陶中绳纹仍在半数以上。新出现的器形有薄胎小罐、喇叭口罐等,器形组合以I式喇叭口罐、A、B型的II式罐、II式折腹罐、II式高领壶、III式高领罐、IV式重唇小口瓶、III式Ba、Bb、AaIV钵、IV缸、AIV深腹罐等。这一时期发现的动物骨骼减少,说明当时的经济形式中狩猎占的比重逐渐在减弱。

三期四段:这一阶段陶器的制作风格、水平和陶质呈逐渐衰退的趋势。泥质陶仍是主流,但数量有所减少,灰褐陶的比例上升到八成以上。夹砂陶中夹粗大颗粒者已只是少量的出现,夹细石英颗粒陶的数量增多。陶器的烧制火候较前两期要低,质地也软,而且表面风化也比较严重。纹饰仍以绳纹为主,夹砂陶器类大多是浅齿状口沿,出现一定的戳印纹。器形中新出现了数量较多的夹粗砂小罐。器物组合有II式喇叭口罐、III高领壶、BaIV式钵、III、IV式重唇小口瓶等。同时折腹罐、A、C型盆、Bc钵、缸等器形已经不见。彩陶题材比较普遍的是较为规整的平行窄线条纹,也有网格纹、弧形条带纹等。这一段房屋居住面遗迹比较集中有少量的彩陶,题材中平行条带纹较为流行。同时这一时期的房屋居住遗迹也比较丰富,而且面积比较大。说明这一时期的人类活动比较频繁。

三期五段:夹粗砂陶中夹页岩和片岩粗大颗粒类已经不见,取而代之是夹相对较细的石英颗粒。陶器的制作风格、水平和陶质总体呈继续退化的趋势。泥质陶数量继续减少。夹砂陶的比例有所增加。纹饰中绳纹还是占主要地位,其中稍细的绳纹比较多,夹砂陶器类大多是浅齿状口沿,戳印纹的数量也有增多。器形种类继续减少,主要有III式高领罐、II式喇叭口罐,II式

夹砂小罐、IV式重唇小口瓶、AIV、BaIV深腹罐、AaIV、AbII式钵等。仍然有极少量的彩陶片,纹饰变化不大。

遗址各期段之间的发展和承接关系非常连贯和紧密,其中第三期遗存与一、二期之间的变化稍显明显,陶器风格要更细腻一些,器形也更小型化;夹粗大岩石和石英石颗粒陶减少并最终被相对较细的粗砂和石英颗粒陶取代。绳纹渐趋细化,一、二期中流行的宽带附加堆纹向较细的间断附加堆纹和绳纹变化,并出现较多的戳印纹;常见的带耳、器物,到第三期时逐渐减少到几乎不见,第三期的陶器中夹砂小罐、喇叭口罐比较盛行,陶器制作、烧造技术上有所下降,质地要差一些,泥质陶的表面也有脱落的现象,表明正处在一个衰落的时期。姜维城遗址出土彩陶不多,有的素面陶器的器形如卷沿盆等与彩陶非常相似,显示了彩陶的衰落,也反映出人们在陶器的制作和功能上更追求简洁与实用性。

营盘山遗址总的文化特征比较清楚,与姜维城遗址同属一种文化,但二者也不是完全相同:1、客观上,相对于后者,前者的早期地层堆积比较薄,被后期的石棺葬及人类活动破坏严重,反映在遗存上时代特征阶段性变化没有姜维城遗址明显。2、虽然营盘山遗址的早期遗存分为早晚两期,但器物组合变化并不大,姜维城遗址常见的重唇小口瓶、厚唇钵等极为少见。3、姜维城遗址第三期中的喇叭口罐也不见于营盘山遗址。4、姜维城遗址细石器主要在第一、二期,虽然也不少,但没有营盘山遗址的精致和发达^[11]。因此营盘山遗址的遗存大致相当于姜维城遗址的第二期,这一阶段也是该区域文化最为发达的一个时期。理县箭山寨遗址出土物不丰富,但可以确定与姜维城和营盘山遗址文化性质相同,其中磨制石器、夹粗砂陶器器形、带双钵的形制与姜维城遗址的第二期相似^[12]。

三、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的属性

以姜维城遗址和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属于马家窑文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其中包含的文化因素并不是单一的,既有占主导地位的马家窑文化,也夹杂有仰韶文化晚期和四川盆地土著文化的因素。

(一) 马家窑文化因素:甘青地区的马家窑

文化包括了石岭下、马家窑、马厂和半山三个类型，也是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其中的石岭下类型是仰韶文化向马家窑文化的过渡；目前在岷江上游地区还没有发现有马厂和半山文化因素；马家窑类型是马家窑文化最具特征和最为繁荣的阶段，在甘肃南部的湟水、洮水、渭河上游、西汉水地区分布较多^[13]。其特征主要是卷唇屈壁盆、敛口钵、彩陶小口长颈壶、瓶及口沿饰平行条纹、网格纹、夹砂粗绳纹的深腹筒形罐、陶环，多平底器，少见尖底器，石器中常见穿孔石刀，骨器较少等，其特征与姜维城和营盘山遗址的大部分遗存很相似，因此传入四川盆地的应为此种类型的马家窑文化。

(二) 四川盆地土著文化因素：主要是夹砂陶器绳纹花边口沿的制作风格和细石器。

在器物的口沿、唇部压饰绳纹而呈花边状的制作手法和风格是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个显著且分布地域较广的特征，从盆地的北部、西部、西北部和东部的边缘地带到川西平原腹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能看到这种文化因素的存在。其自身也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盆地北部和西北部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通常只在夹砂陶器的口沿作这种风格的修饰，而在川东峡江、川西平原地区的遗存中这一因素已经相当的发达，泥质陶和夹砂陶器的口沿都使用了这种手法，到商周时期更是发展到一个鼎盛阶段。

细石器是四川盆地土著文化中另一个比较突出的因素。虽然四川盆地的细石器源起于本地还是来自北方尚待进一步的探讨，但众多的考古材料证明，细石器在四川盆地出现较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普遍分布于四川盆地的北部、西部、西北部等边缘地区的遗存中，成为构成本地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一直延续到了商周甚至铁器时代。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部分遗址中也出土有细石器，但主要是在宁夏南部、青海、甘肃西部，数量也不多；而且这一地区的细石器从年代和技术类型上看，与盆地内的细石器并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14]。靠近四川盆地的甘南渭水上游、湟水、洮水流域鲜有细石器出土，白龙江流域的大李家坪遗址中也没有发现这一因素的存在。因此，马家窑文化在进入四川盆地时自身并没有带来细石器，岷江上游的姜维城、营盘山

等遗址中出土为数不少的细石器应该是盆地土著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极有可能受到川北细石器的影响。

(三) 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对马家窑文化的影响一直存在，尤其是在甘肃东部、渭河流域这种混合文化比较常见，甚至延续到之后的齐家文化。姜维城遗址和营盘山遗址等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的确包含有一部分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类型)的因素，如卷沿彩陶盆、重唇小口瓶、两端缺口石刀等，但几乎不见有尖底器，因此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并不是受到仰韶文化的直接影响，后者在进入四川盆地前已经融入到了马家窑文化中，随后才作为一个整体传入。

四、岷江上游新石器时期文化、经济形态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布鲁斯·炊格尔曾指出：“整个文化是自然环境与技术相互作用的产物。文化之间的多样性是适应特殊环境的不同要求的反映，因此不同的生态的潜力与不同的经济开发相联系，后者又依次与有社会结构的不同形式来实现的不同的相关要求相联系”^[15]。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经济形态与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岷江上游调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及石器出土地点分布范围北起松潘中部、南达汶川县中部、西至茂县西部、理县中部，遍及整个岷江上游。其中大部分的遗址都分布在二级以上的台地，高出河床在数十米甚至数百米以上，在河谷地带很难发现有早期的遗存。这是因为岷江上游为中国流速最快的河流之一，河水多在两岸比较陡直的峡谷中下切，流域中发育比较好、面积较大的台地和平坝非常少，稍大的台地都在较高的地方。气候更接近于西北地区干冷、温差大的特征。姜维城遗址、营盘山遗址、箭山寨遗址都发现有一定数量的房屋居住遗迹，有单间也有多间，同时期的黄河上游地区已经比较普遍的种植粟、黍等旱地作物，营盘山、箭山寨遗址也出土有炭化的黍和粟类颗粒，同时出土的穿孔石刀和两端缺口石刀在黄河流域通常是作为收割工具使用，说明当时是一种以种植粟、黍为主的定居农业形态。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决定了采集和畜牧业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姜维城、营盘山、箭山寨等遗址都出土了为数不少的

兽骨,初步判断小者如兔、大者有猪等动物;同时出土了较多的细石器,虽然细石器并不能肯定说明狩猎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但结合岷江上游的地理和生态环境,说明狩猎和畜牧业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还占有比较大的比重。从岷江上游的早期遗址规模不大和分布稀疏的特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岷江上游人口并不多,也不太集中,而且地处山地,背靠高山,台地面积不大,种植业收获有限,狩猎和畜牧业能在很大程度上补充甚至满足当时居民的生活需要,此外遗址中发现的鱼骨、网坠等数量并不多。因此虽然地处岷江及其支流两岸,但对山地的依赖性恐怕比河流自身要大得多,这也是不同于盆地内其他地区早期经济形态的一个特点。

五、马家窑文化在四川盆地内的传播与影响

关于马家窑文化进入四川盆地后的传播路线和影响范围,石兴邦先生曾指出“第二种可能是马家窑文化进入西南地区,它涉及的范围即后来的羌戎民族居住区,向东甚至达到了川东地区三峡一带。四川西北汶川一带发现有同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相同的彩陶片,可以作为直接或间接的证据。中原华夏居民同西南和长江原始居民发生联系,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沿汉江到达江汉地区,一条是从甘南沿西汉水、嘉陵江而到三峡地区。也许还有一条沿甘南到川南的路线而与当地的原始居民发生联系”^[16]。已经有直接考古材料证明的是岷江上游、白龙江流域(嘉陵江支流)、大渡河流域的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存中或多或少包含有马家窑文化的因素,是在其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范围内。

(一) 嘉陵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其最大支流—白龙江和广元附近的上游地区

1、大李家坪遗址位于嘉陵江上游,是一处近年来经过正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7]。遗址的遗存分为三期:一期为仰韶文化半坡期,二期属大地湾四期,三期为仰韶文化晚期。发掘者将第三期遗存归属仰韶文化晚期是因为其中有一些仰韶文化的因素,实际上所含马家窑文化的因素也不少,同时甘肃东部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中彩陶已经不多见了,而大李家坪遗址自始自终彩陶都比较的发达。大李家坪的二期即大地湾四期遗

存中就有与姜维城遗址和营盘山遗址很多相近的地方。到了第三期与姜维城和营盘山遗址有着更多的相似点,如陶系以泥质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其次是附加堆纹,器形都见深腹筒形罐、重唇小口瓶、厚唇钵(原文的Bb型瓮)、折沿卷沿盆、基本都是平底器,几乎不见尖底器,穿孔石刀、陶环较多,这种以马家窑文化为主体、包含了仰韶文化和盆地土著文化的混杂文化南下并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西部地区有较大影响。

2、广元附近的中子铺、张家坡、邓家坡等遗址与姜维城、营盘山遗址中的夹粗砂陶器和细石器也有许多相近的特征:火候很低,质软,粗糙,表面风化,特征原始。其中夹砂陶多为红褐陶和灰褐陶,有的加粗砂颗粒(粒粗达3厘米左右),表面风化较甚。表饰绳纹为主,个别饰划纹和指甲印纹状的连续戳印纹,口沿外饰附加堆纹,灰褐陶多附加堆纹,若干方唇上饰绳纹或齿状或绞索状装饰的陶片,以平底器居多,有圈足碗等。细石器多系就地取材,以黑色燧石、石英石为主要原料,使用间接和直接方法打片、压片或剥片。川北诸遗址遗址不仅文化面貌比较原始,同时碳十四测定的绝对年代也要较马家窑文化早,其年代序列依次是:中子铺早期遗存(距今6000~7000年)—中子铺晚期遗存和张家坡遗址(距今约5500~6000年)—邓家坪遗址(距今约4700~5500年)^[18]。因此应该是上述四川盆地早期文化的代表,在马家窑文化进入时对其施加了影响。

(二) 与大渡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

大渡河流域经过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集中在上、中游地区的丹巴和汉源县一带。这一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总体上反映的是四川盆地土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夹砂陶花边口沿、粗绳纹和附加堆纹、细石器等,同时不少遗址的遗存中也体现了马家窑文化的一些因素。如丹巴中路乡的罕额依遗址一期遗存中虽然只是出土个别的彩陶片,但足以证明马家窑文化的影响曾经波及到这里,同时出土的鸡冠状双瓣陶钵和穿孔石刀与姜维城遗址三期遗存中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19]。汉源狮子山遗址位于大渡河中游,也出土有一定数量红底黑彩的彩陶片^[20]。汉源姜家屋基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出土的泥质重唇小口瓶,其形制与姜维城遗址出土

的同类器物几乎完全一致,这是目前为止已发现的马家窑文化在四川盆地内影响到的最西南边的一处遗址^[21]。与岷江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相比,大渡河的早期遗存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所含马家窑文化的因素显得非常的少,且多与岷江上游相似。

(三) 是否影响到川西平原早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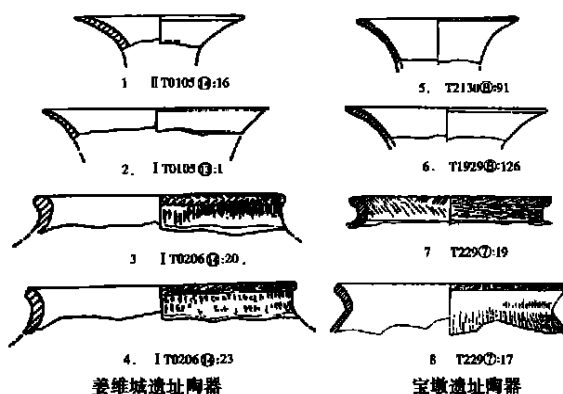
川西平原的边堆山遗址、三星堆文化一期、宝墩文化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同时与川东峡江地区的哨棚嘴、中坝等遗址为代表的文化之间也有比较多的相似之处,大多数学者认为应属同一类型的文化。而岷江上游以姜维城、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类型中有川西平原早期文化相似的一些因素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岷江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发展到姜维城遗址的第三期,陶器有了比较大的变化,趋于细化、小型化,夹砂陶中夹粗大颗粒类逐渐减少直至消失,那种口沿下和器身饰宽带状附加堆纹加绳纹的风格由宽到细,附加堆纹由单纯的水平箍带状到间断、斜向形。带耳和鬲的器物已少见。制陶技术和烧造水平有所下降,陶质总体上有下降。第三期遗存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相比较,有不少的共同点:陶系都是以泥质陶为主,平底器最常见,有少量圈足器,流行附加堆纹、绳纹、戳印纹,夹粗砂花边口沿罐形制非常相似,第二期遗存中新出现并在第三期发展到一定数量的喇叭口罐是宝墩文化最常见的器形之一,高领罐较多,带耳和鬲的器物较少^[22](图二)。

四川盆地内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绝对年代偏早者多分布在盆地周围边缘山地,川西平原的遗址时代相对要晚一些,说明同中国众多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趋势一样,这一时期四川盆地的人类活动经历了从山前高地和丘陵地带逐渐向平原腹地地带的过渡,生产方式也实现了从旱地农业向稻作文化的转变。川西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形成很可能是来自上述地区多种文化影响的结果,有川北土著文化为源头、马家窑文化主导的岷江上游早期文化的因素,也与川东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交流,而且这种影响是在其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发生的。

六、结语

岷江上游承载着黄河上游与四川盆地之间早



图二 姜维城遗址陶器与宝墩遗址陶器

期文明的交流与互动,也是史前时期南北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一环。姜维城、营盘山等史前遗址的发掘,突破了长期以来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因资料缺乏而徘徊不前的局面。姜维城遗址的三期遗存基本涵盖了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内涵,代表了其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期是承接了马家窑文化与盆地文化的交流;第二期则是马家窑为主导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第三期反映这支文化发展、逐渐衰落、转变的过程。但这并不代表已经揭示了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的全貌,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单纯的四川土著文化遗址,对马家窑文化传入前的原貌的认识仍不太清楚,同时这支文化的最终去向、与周边文化之间联系存在的缺环以及区域文化特征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等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本文其它彩色图片见内文彩色图版三、四)本文得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支持,谨表谢意。

注释

[1] 《威州彩陶发现记》,《说文月刊》4卷合订本1944年。

[2]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茂汶自治县考古调查》,《考古》1959年第9期。

[3][12]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四川理县汶川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

[4][1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汶川县姜维城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四川文物》2004增刊。

[5]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2000年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

[6][7][11] 蒋成、陈剑:《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
(下转39页)

[15] 赵志军:《稻谷起源的新证据(摘要)》,《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16] 刘志一:《玉蟾岩遗址发掘的伟大历史意义》,《农业考古》1996年第4期。

[17]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18] 孔昭震等:《河南舞阳湖遗址八千前水稻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6年第12期。

[19] 张文绪等:《澧县梦溪八十处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1期。

[20] 黄渭金:《河姆渡稻作农业剖析》,《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21] 王才林等:《高邮龙虬庄遗址原始稻作遗存的再研究》,《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22] 袁平荣:《云南元江普通野生稻分化的研究——普通野生稻与粳亲亲和性的初步研究》,《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23]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曲江石硤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7期。

[24] 张合荣:《贵州史前考古与农业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25]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

[26] 尤维组:《江苏江阴县璜塘发现四口良渚文化古井》,《文物资料丛刊》第五辑。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28] 陆耀华等:《浙江嘉善新港发现良渚文化木筒水井》,《文物》1984年第2期。

[29] 李衍垣等:《飞虎山洞穴遗址的试掘与初步研究》,《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30] 张以容:《贵州威宁中河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文物》1973年第1期。

[31] 宴祖伦:《威宁吴家大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贵州文物》1983年第1期。

[32] 宴祖伦:《威宁东山新石》,《贵州文物》1984年第1期。

[33] 禹明先:《土城发现新石器线索》,《贵州文物》1983年第3—4合刊。

[34] 宋先世:《贵州榕江发现石器》,《考古》1986年10期。

[35] 何凤桐:《毕节青场新石器》,《贵州文物》1982年第1期。

[36] 席克定:《贵州毕节青场瓦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4期。

[37] 刘恩元、熊水富:《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报告》,《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

[38][41] 贵州考古所:《贵州兴仁交高乐汉墓发掘报告》,《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

[39]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第5期。

[40] 贵州省博的馆:《贵州赫章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级、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或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41] 贵州省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

[42] 严平:《贵州安顺宁谷汉墓》,《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第4期。

(责任编辑:于春)

(上接14页)化发现与探索》,《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

[8] 《班村遗址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3年2月21日。

[9] 陈洪海:《甘肃青海地区史前墓葬中人骨处理方式的初步研究》,《中国青海省におけるシルクロード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V01.14 2002年。

[13]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14] 李永宪:《略论四川地区的细石器》,《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

[15] 布鲁斯·炊格尔著:《时间与传统》(蒋祖棣、刘英译),三联书店。

[16] 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第6期。

[17]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甘肃武都县大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3期。

[18] 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1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

[20] 马继贤:《汉源狮子山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

[2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汉源县2001年度的调查与试掘》,《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3年。

[2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宝墩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发掘和研究》,有限会社阿普(ARP),2000年。

责任编辑:(于春)

●图版三 姜维城遗址及出土器物（一）



1. 姜维城遗址外景(南—北)



2. 玉环



3. 石网坠



4. 细石器



5. 玉环



6. 磨制石器



7. 出土陶器口沿



8. 磨制骨器

●图版四 姜维城遗址出土陶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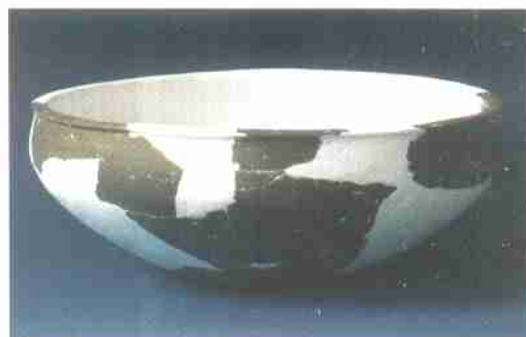
1. 彩陶器底



2. 彩陶器口沿



3. 彩陶器残片



4. 陶盆



5. 带鬃陶盆



6. 陶罐



7. 陶钵



8. 陶钵